

昌明教育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

侯怀银 李艳莉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昌明教育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

侯怀银 李艳莉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昌明教育: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侯怀银,
李艳莉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3939-7

I.①昌… II.①侯…②李… III.①商务印书馆—
关系—教育事业—研究—中国 IV.①G239.22②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533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昌明教育: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
侯怀银 李艳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939-7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定价:42.00 元

序 言

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指出：“出版界与一国之文化有密切关系。”由此，作为学术思想传播和交流的中介与平台，出版机构的创办和发展及其出版物的发行，不仅对一国文化的保存和推陈出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学术研究传承和学科建构，有助于强化学术研究气氛，促进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和竞争。

商务印书馆诞生之际正值晚清时期，是西方思想、科技等不断影响我国的时期。教育学同样如此，是不断接受外国教育学影响以及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融合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机构，在传播外国教育学以及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诞生时间略早于中国教育学的商务印书馆，于先期便意识到其在服务教育、提升民众素质方面的作用。1902年，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之一张元济在应夏瑞芳的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时，便与其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此理念以及“昌明教育，开启明智”的办馆宗旨的引导下，商务印书馆编定教科书直接服务于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以书籍、《教育杂志》等出版物为平台，“译述关于教育之新学理”，介绍和出版国人最新的教育学著作，推动教育学中国化、教育学科学化以及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尝试办幼稚园、尚公学校和函授学校，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学理论直接进行教育实验和改革。通过教育学术出版和教育实践、实验等有关“教育”“教育学”的多方位活动，随之意识到教育学与教育发展间的关

系, 以及中国教育学人加入商务印书馆等因素的影响, 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也逐渐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商务印书馆奠定了近代出版的起点, 也是近代教育学术出版的起点, 为近代中国教育、教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教育学发展舞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其在教科书、近代教育思潮传播等方面的地位也被充分肯定并受到关注。有关商务印书馆及其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期刊以及发行的电影等研究, 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制度、经营管理研究, 商务印书馆与文化传播研究, 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研究, 商务印书馆人物研究, 商务印书馆教育实践研究等方面。

综观这些研究, 关于商务印书馆聚集的中国教育学人群体的研究尚不够细致。研究者还没有系统整理和分析商务印书馆内中国教育学人的角色以及群体特点。虽然已有研究已经提及《教育杂志》作者群体, 但是这与商务印书馆内中国教育学人群体还有所不同, 因缺乏商务印书馆内整体中国教育学人群体的呈现,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商务印书馆何以能够出版教育学类书籍以及推动教育学发展作用的认识。此外, 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学类著述急需深入整理和分析。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 相关著作已经再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教育学著作、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学著作, 以及《教育杂志》发表的相关教育学文章, 但多停留在呈现、罗列层面, 尚未上升到解析相关教育学著述与教育学中国化、科学化、学科体系、学科独立性关系的层次。因此, 有必要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相关教育学著述, 按照中国教育学发展路径, 解析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到目前为止, 尚未有一部专门以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学为题目的专著, 更谈不上系统梳理商务印书馆聚集的近代中国教育学人群体及其为教育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全面认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对近代教育学中国化、科学化以及学科体系构建所做的贡献, 以及商务印书馆教育实验对近代教育、教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 在回顾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教育学走过的百年发展历程的同时, 很有必要转换视角, 专门就商务印书馆与中

国教育学发展进行全面审视,为当前教育学术出版以及出版社推动教育学发展提供启示。

本书旨在对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进行比较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试图围绕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中国教育学发展关系这一主题,勾勒商务印书馆引进和传播西方教育学、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的过程和努力,为当前商务印书馆乃至教育学术出版更好地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研究的基本思路为:第一,研究商务印书馆产生及与中国教育、教育学的水乳交融关系,具体展现办馆宗旨与办馆人的教育情怀,以及馆内聚集的中国教育学人群;第二,通过对商务印书馆译介出版的西方教育学论著、《教育杂志》对西方教育学的译介传播的考察,描绘商务印书馆推动西方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整体画面;第三,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人撰写的教育学论著、《教育杂志》对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本土探索为切入点,探寻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内在逻辑;第四,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教育实践和实验进行研究,再现尚公学校、函授学校等本土教育实践情形;第五,揭示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影响,指出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就出版社如何传播西方教育学、发展中国教育学等形成相关认识。

我们在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时,指导思想很明确,即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可靠的资料,并对历史资料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试图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揭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关系。虽然本书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可以称得上是尽心尽力了。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直接引用的在书中已标明,有些并未一一标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我们于2014年11月在山西大学相遇,期间我提到了这一选题,于总欣然答应,并将其作为商务印书馆120周年馆庆项目。感谢商务印书馆太原分馆李智初总编辑对本书的大力支持,也感谢责任编辑史慧敏的辛勤劳动。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与教育的关系	1
一、商务印书馆的初创与发展	2
二、办馆宗旨与出版人的教育情怀	9
三、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教育学人群	15
第二章 商务印书馆与西方教育学的传播	24
一、商务印书馆译介出版的西方教育学论著	25
二、《教育杂志》与西方教育学的译介传播	47
第三章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	99
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人所撰教育学论著	100
二、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教育学类大学丛书	123
三、《教育杂志》与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探索	127
第四章 商务印书馆的近代教育实践和实验	141

一、养真幼稚园的创办与教育改革实验	141
二、尚公学校的创办与教育实验	145
三、函授学校的兴办与民众素质的提升	163
第五章 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影响	169
一、教育现代化——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教育学发展产生影响 的基础	170
二、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中的地位	173
三、商务印书馆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启示	180
附 录.....	186
一、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大事记 ...	186
二、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教育学著述	192
三、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人自撰教育学著作和 教材	201
参考文献.....	209

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与教育的关系

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由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昌四人共同集资四千元而建。商务印书馆诞生之初以印刷业为主,承担一些报表业务等,并以印行《华英初阶》等字典、辞典而起家,但是那时候的商务印书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印刷家,不能算是出版家”。随着1902年张元济先生入馆并组织编译所,尤其是1902~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为着辅助那时候最初颁行的新教育,开始编辑所谓‘最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地位才由印刷家而进为出版家”^①。同时,张元济入馆后,商务印书馆明确了“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宣告了其与教育的密切关系。编印教科书成功后,商务印书馆在教育界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其发展模式为当时其他出版机构竞相模仿。之后,商务印书馆另一位核心人物王云五于1921年进馆,并对编译所进行了改革,按学科进行分组,成立国文部、哲学教育部、史地部等不同机构,同时网罗了大批学科专家和人才,也会聚了一批中国教育学人。各学科专家以及其中的教育学者、教育研究者,从专业角度出发,有效地推动了商务印书馆各学科及其教育类、教育学类图书的出版。同时,商务印书馆继续印行中小学教科书和《辞源》《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使其逐步成为国内最大的出版家。当然,商务印书馆在发展中也遭遇了日军轰炸,使其出版的书籍绝大多数被毁坏,东方图书馆也付之一炬。但是,商务印书馆仍然坚持每日出版一册新书,复刊《东方杂志》,编印《大

^① 王云五《王云五文集6: 岫庐八十自述》(上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38页。

学丛书》。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在“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指导下,一直服务于当时大中小学教育及其教科书的出版,会聚了一批中国教育学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教育变革和中国教育学发展。

一、商务印书馆的初创与发展

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诞生到1949年,经历了初创期(1897~1904)、发展期(1904~1932)、恢复期(1932~1937)、衰落期(1937~1949)。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商务印书馆由“印刷家”发展为“出版家”,且出版规模、营业额等迅速扩大,各项组织机构逐步完善,科学管理法等也被应用,成为当时出版界的执牛耳者。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与教育关系密切,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大中小学教科书。当然,商务印书馆也与教育学的发展关系密切,通过书籍、《教育杂志》译介了西方教育学,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初创(1897~1904)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昌四人共同集资四千元,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三号“租屋三楹,经营印刷”,共同创立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初仅有印书两架”^①,只是一个“专以代人印商业文件”^②,以赚钱为基本目的,获得相应利润的小印刷厂。此时,夏瑞芳等人意识到了“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并开始积极筹划由印刷转为出版,以扩大商务印书馆的事业。1898年,商务印书馆迁至北京路,“有房十二楹,添购机器”^③。在此基础上,商务印书馆于同年出版了我国近代第一部学术著作《马氏文通》。同时,夏瑞芳等人意识到社会上学习英语的风气日盛,尤其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更是如此,遂开始着力开发英语教材。他们特地聘请了谢洪赉牧师等,将英国政府为印度殖民地编写的《印度读本》翻译为汉

① 吴冕《参观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记》,《复旦杂志》,1918年第6期,第4页。

② 大木《商务印书馆创办人鲍咸昌》,《工商新闻》,1947年第97期,第5页。

③ 《商务印书馆简史》,《政治评论》,1933年第74期,第815页。

语,亦于189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双解汉英词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并将其分为上下两册出版。该词典一经出版大受欢迎。1899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1900年,商务印书馆以低价盘进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修文印书局,这又使得商务印书馆学会了应用近代印刷术印刷出版物,使其实力有所增强,出版业务继续拓展。此时的商务印书馆看到教科书市场的巨大潜力,并开始进行出版教科书的尝试,翻译和出版了日本教科书。1902年张元济进馆后,不仅招添股款充实资本,还进一步意识到,商务印书馆不能仅局限于印书和出版日本教科书,要在出版界站稳脚跟,还必须大胆地朝出版业发展,聘用有学识的人,成立编译所,出版自己的教科书和报刊等。190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在北福建路建印刷所,在唐家卫设编译所,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在棋盘街设发行所,尝试策划选题、组织发行等。也正是这一年,商务印书馆第一部混合教科书《文学初阶》问世。1903年10月,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并在汉口设立了第一个分馆。此时,《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张元济按照《奏定小学章程》筹划编撰了我国第一套小学分科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04年,商务印书馆又编印了《女子小学教科书》和《最新中学教科书》。至此,商务印书馆初步发展,生产规模初具,且开始出版与教育关系密切的教科书,吸收了蒋维乔、庄俞等教育学人入馆担任编辑。

(二) 商务印书馆的发展(1904~1932)

190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东建总厂,占地80多亩,内含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1915年,在张元济的支持下,商务印书馆设立总务处,“是为统辖全公司之最高机构”,决定全公司的行政、用人和财政事务。除总务处外,还设立了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由此,商务印书馆形成一个集中且分层次的管理体制,在分工协调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业务。^①此外,1921年王云五进馆后,对编译所进行了改革,

^① 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6页。

按学科进行分组,成立国文部、哲学教育部、史地部等不同机构,同时网罗了大批学科专家和人才,各学科专家从其专业角度出发,有效地推动了商务印书馆各学科图书的出版,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不仅如此,王云五还引进了科学管理法,使得商务印书馆的硬件设备、资本以及营业额等节节攀升。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拥有铸字间、排字间、校对间、制版间、雕刻间、石刻间、铅印间、照相间、装订间,其营业房屋数目也不断增加,如表1-1所示:

表1-1 商务印书馆历年营业房屋建设数目及价钱表

年代(年)	1897	1907	1912	1913	1916	1917	1919	1920	1921
数 目	2	2	1	3	3	3	2	5	4
原价(千元)	72	159	58	46	70	16	91	23	190
估价(千元)	64	143	52	41	64	14	64	17	113
年代(年)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数 目	6	4	6	5	7	1	2	1	5
原价(千元)	340	125	167	159	185	9	36	2	211
估价(千元)	193	65	112	124	64	4	13	1	60

资料来源:《商务印书馆营业概况》,《中行月刊》,1931年第4期,第126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至1930年的营业进展经过,其建筑房屋数目不断增加。当然,商务印书馆自1912年至1920年,“建筑房屋虽不下二十余所,而规模均极狭小,费用亦颇微弱;至1921年,则范围不断扩大,而且建筑费用,次渐增加,盖此时适当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出版书籍,如雨后春笋,公司努力扩充印刷工场,增设各地分馆”^①。由此,商务印书馆在“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图书馆运动等契机下,得以在北京、杭州、武昌、烟台、扬州、安庆、九江、南京、重庆、宁波、香港、新加坡、横滨

① 《商务印书馆营业概况》,《中行月刊》,1931年第4期,第126页。

等18个城市组织代销处，使得出版拥有了较为广泛的发行基础。^①通过妥善经营和精密安排，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种类日益增多。截至1930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图书8039种18708册。^②在此基础上，商务印书馆营业额逐步增加，如下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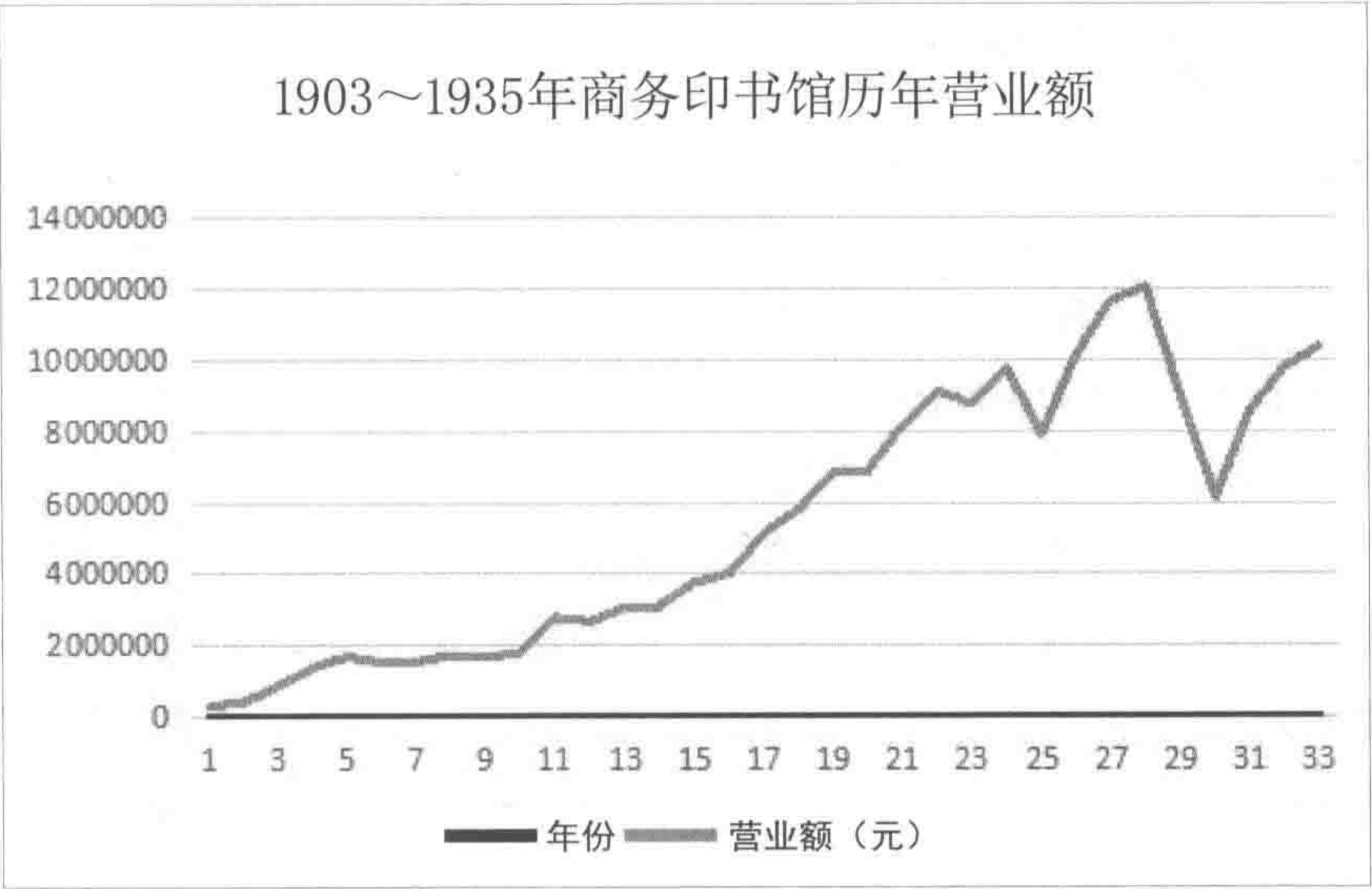


图1-1 1903~1935年商务印书馆历年营业额图

资料来源：《商务印书馆历年资本比较表》，《同行月刊》，1936年第4卷第12期。

由上图可见，商务印书馆历年营业额整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1903年总营业额为30万元，1935年已达到10363293元，33年间翻了34.54倍。在营业额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商务印书馆的资本亦逐渐增加，如图1-2所示：

①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君》，《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② 李泽漳《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第3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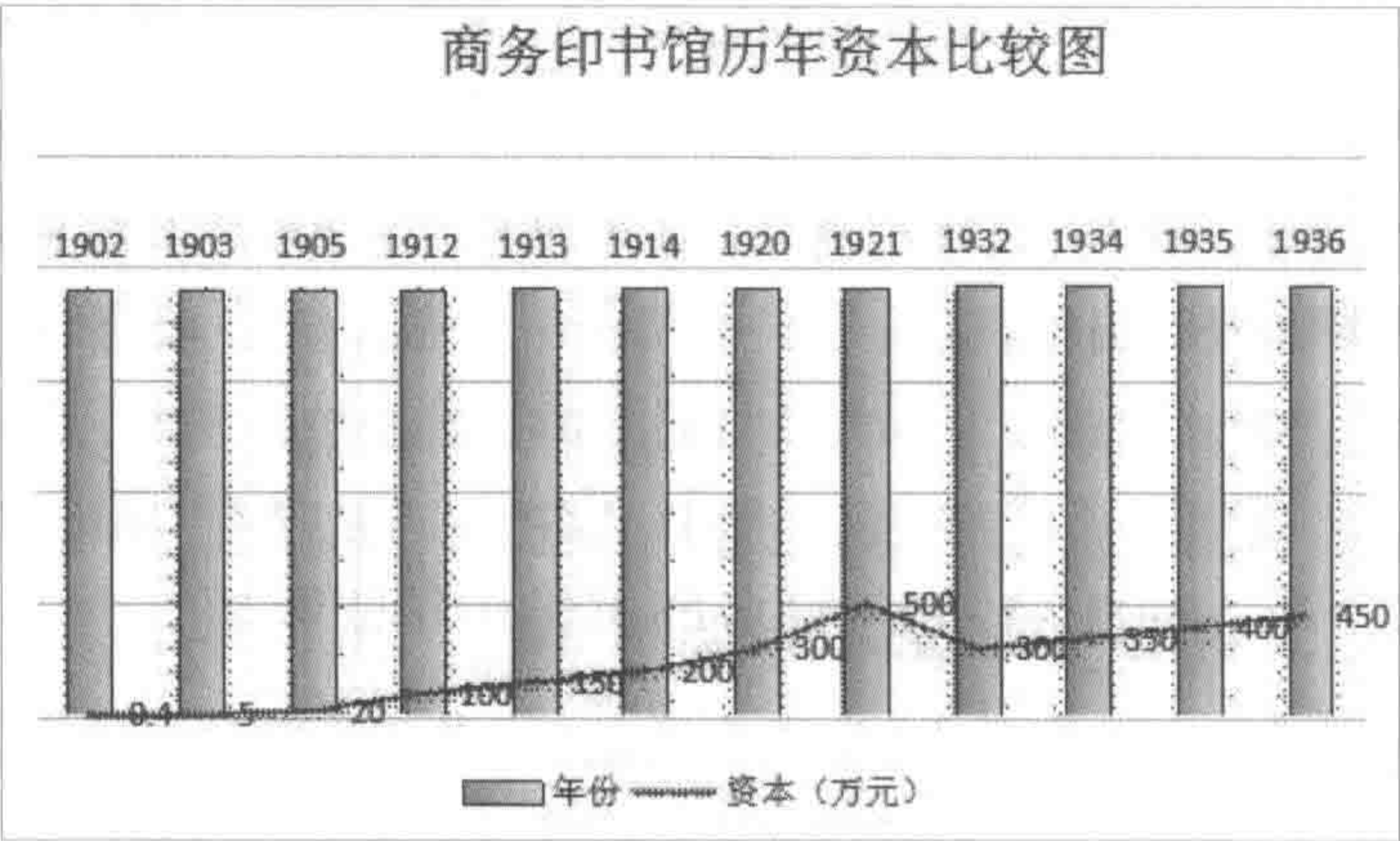


图1-2 1902~1936年商务印书馆资本比较图

资料来源：《商务印书馆历年资本比较表》，《同行月刊》，1936年第4卷第12期。

由此，商务印书馆资本由最初的4000元，增加至1921年的500万元，以及1936年的450万元，翻了1200多倍。商务印书馆不仅实现了资本的逐步积累，而且营业种类日益繁多，“编印学校图书、古今国学、科学、参考书、丛书、杂志，承印中外书报、证券、股票、印花、贴头、招纸、广告、簿册、单据、名片、柬帖，制造铅版、纸版、电镀铜版、照相彩色铜版、锌版、木版、各种教育文具、玩具、体育器械、印刷业用品、华文打字机、印刷机器、中西铅字、铜模、花边、花图、纸张、油墨、国语、英语、留声机器片、美术徽章、欧美原版西书、照相器具，不胜缕述”^①。种类齐全的出版，使商务印书馆可以全面满足教育、商业等各种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资本、营业额逐步增加，在出版界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与教育的关系也更加密切，除一如既往地出版各类教科书外，还注重创办教育类专业学术刊物，出版教育学类图书，开展教育实验。1905年尚公学校、1909年养真幼稚园的创办，显示了商务印书馆“以试验世界最新教育为职志”，而非停留在教科书的出版和教育学理的译述和介绍

^① 《商务印书馆》，《妇女旬刊》，1927年第288、289、290期合刊，第727页。

上。^①1909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创办了专业教育刊物《教育杂志》,涉及各级各类教育、中西教育等研究,成为当时教育学界讨论和交流教育学术的平台,也为教育工作者汲取最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学术成果提供了媒介。不仅如此,此时期商务印书馆成立哲学教育部后,成为聚集教育学专家、学者的阵地和学术机构,唐钺、范寿康、高觉敷、朱经农等均聚集于此。对于刚毕业两年多的高觉敷来说,进入商务印书馆哲学教育部就好像“考入了一个研究院”,哲学教育部就像“哲学教育学科的研究所”。^②正是由于会集了诸多专攻教育学的专家、学者的哲学教育部的存在,商务印书馆编译和出版了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各类书籍^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三) 商务印书馆的恢复(1932~1937)

1932年1月29日10时,日军刻意轰炸了商务印书馆。日军飞机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投下六枚炸弹,印刷厂、制造总厂、栈房等建筑顿成火海、浓烟四起。这次轰炸后,商务印书馆各种印刷机器全部被烧毁,46万册珍贵的古籍化为灰烬,就连十里开外的法租界,也从空中随风飘下焦黄的《辞源》《二十四史》残页。四天之后,当时马路对面的东方图书馆,也被潜入的日军放火焚烧。商务印书馆损失巨大,据统计,总厂、编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房屋、教育用品等损失达16330506元。^④当然,商务印书馆的损失远不能用钱来衡量,各种珍贵典籍等均不复存在。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但其“自觉负荷我国文化责任之重”,于1932年8月1日起成立总管理处,代替总务处,复业上海发行所,并筹备小规模印刷制版等厂。复业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仍能充分供给,辞典、教授修业等重要参考书亦可照常供给,《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以及《儿童画报》四种杂志于10月份先行复刊和发行。

① 《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改组概况》,《教育杂志》,1922年学制课程研究号,第11页。

② 高觉敷《回忆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7页。

③ 侯怀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附录部分。

④ 《商务印书馆损失统计》,《民众周报》,1932年第216期,第9~10页。

《东方杂志》复刊后,加了国文、艺术、妇女、教育等专栏,以弥补原先订阅小说、教育、妇女杂志等的读者因相关刊物没有复刊而无法阅读相关信息的缺憾。商务印书馆的新书仍源源不断地出版,仍以尽力介绍中西名著为主旨。^①

总体来说,商务印书馆复业期间,“鉴于学术救国之重要,于同年十一月一日,宣布每日出版新书至少一种,五年以来,从未间断,且逐渐增加至每日三四种,教科书及大部书尚不与焉”^②。由此可知,商务印书馆为满足全国教育事业的需求,教科书、参考书等出版物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同时,由于《教育杂志》停办,商务印书馆通过《东方杂志》传达各种教育信息。此外,出版教育学类书籍依旧是题中之义,且注重出版新书。以1934年1月到6月出版的教育学类书籍为例,如表1-2所示:

表1-2 1934年1月到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学类书籍统计表

类 别	书 名	作 者
教育原理	教育与群治	赵演 译
	自然主义与教育	薛文蔚 著
	天才心理与教育	赵演 著
	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	蒋梦麟 著
	各国教育的哲学背景(景)	陈礼江等 译
教育史与教育状况	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	陈明志、唐毅 译
	比较教育	陈作樑、刘家璦 著
	德国新兴教育	张安国 译
教育测验	教育测验	陈选善 著
教学法	小学各科新教学法之研究	钟鲁斋 著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概论	庄泽宣 著
	日本之职业教育	潘文安 著
校舍及学校设备	学校之建筑与设备	李清悚 著
初等教育	玩具教育	王国元 著

资料来源:《商务印书馆本年一月至六月出版新书》,《出版周刊》,1934年第93期,第23~24页。

① 大公《最近之商务印书馆》,《中国新书月报》,1932年第9~10合刊,第35~36页。
② 《商务印书馆110年大事记(1897—2007)》,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3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商务印书馆复业期间,出版的教育学类书籍依旧涉及教育学各分支学科,教育原理、教育史、教育测验、教学法、比较教育等均在其中。此外,上述教育学类书籍呈现著作居多、译述减少的态势。以前述两项来看,商务印书馆复业期间,依旧注重推动教育学中国化以及完善教育学学科体系。

(四) 商务印书馆的衰落(1937~1949)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商务印书馆于长沙设总管理处,并在上海、香港设办事处。抗战初期,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因为战争而过多地影响书籍出版和刊物发行,相继出版了《中华民族的人格》《逻辑》《中国算学史》《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钟祥方言记》等著作,还创办了《文学杂志》《东方画刊》《健与力》等刊物,编印了《职业学校教科书》以及与抗战活动密切相关的《抗战小丛书》《战时常识丛书》等。1945年后,由于通货膨胀速度较快,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已经难以维持,出版物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减少。不仅如此,1947年国民政府实行“固定本教科书开放版权”,致使商务印书馆失去了多年来出版教科书的优势。由于出版利润有所下降,资金难以支持,以及出版教科书优势的丧失等,商务印书馆至1947年已经负债累累。

在此情势下,商务印书馆虽出版教育学类书籍,但数量亦逐步减少。此阶段出版了张宗麟《教育概论》、范任宇《教育概论》、赵廷为《小学教材及教学法通论》、沈雷渔《小学各科教学法》、龚启昌《哲学普通教学法》、朱智贤《小学课程研究》、吴增芥《初等教育》等。就数量来看,与前一阶段难以匹敌;就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分支学科体系的构建来看,并没有新兴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

二、办馆宗旨与出版人的教育情怀

法国汉学家戴仁在其著作中指出,一般而言,“出版社有两副根本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